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AI GUO ZHU YI JIAO YU CONG SHU

★ 第十一卷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第十一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本卷目录

郭嵩焘

一、科场少年	(3)
二、湘军高参	(5)
三、天子近臣	(7)
四、洋务观初步形成	(10)
五、再次出山	(13)
六、罢官赋闲	(16)
七、出使之前	(18)
八、第一任公使	(22)
九、对西方国家的考察	(28)
十、从欧洲看日本	(32)
十一、正副不和	(33)
十二、出使归来	(36)
十三、批评时政	(40)
十四、禁烟公社	(42)
十五、不甘寂寞的晚年	(44)

曾纪泽

一、严格的家庭教育	(51)
二、研究西学,步入外交生涯	(52)
三、沙俄争夺我国伊犁的卑劣行径	(57)
四、受命危难——中俄伊犁改定条约谈判	(64)
五、中法越南交涉	(75)
六、中英鸦片税厘交涉	(87)
七、归国之后	(92)

黄遵宪

一、人小志气大	(99)
二、科举路上徘徊	(101)
三、外交生涯	(105)
四、致力维新变法	(113)
五、“诗界革命”的旗帜	(119)

梅汝璈

一、早年经历	(147)
二、执法东京	(152)
三、心向祖国	(184)

盛宣怀

一、出身封建官僚家庭	(195)
二、科举不第而转办洋务	(197)
三、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	(199)
四、经营电报局	(204)
五、督办铁路总公司	(207)
六、创办中国通商银行	(211)
七、总理汉冶萍公司	(213)
八、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	(230)
九、八国联军入侵时导演“东南互保”	(236)
十、与袁世凯的矛盾斗争	(240)

郭 嵩 焘

危兆盖 编著

在近代中国，出现过很多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志士仁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是他们的代表，郭嵩焘也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

一、科场少年

郭嵩焘的先祖原籍江西吉安，明代万历年间迁至湖南湘阴。到他的曾祖父时，郭家因为善于经商，已成为湘阴有名的富户。到他的父亲那一代，虽然还经营借贷，但家境已开始衰败，有时穷得全家“不能举餐”。1818年，郭嵩焘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地主家庭里。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因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养知书屋”，所以，又被人称为养知先生。

郭嵩焘从小聪明过人，深得父辈喜爱。加之他又勤奋好学，因此，家里决定不惜一切让他读书，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一个超越前辈、有所作为的人。1835年，郭嵩焘17岁。这一年，他考中秀才，在科举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第二年，家里送他到湖南最有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在岳麓书院，他与后来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曾国藩、刘蓉等结为至交。他们当时都是志大气盛、自视颇高的年轻学子，但曾、刘专攻程朱理学，后来逐渐向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方向发展，郭嵩焘则喜欢词章之学，带着更多的文人气质，因而，与封建正统就有些格格不入。曾国藩后来在评论郭嵩焘时，就直言不讳地说郭嵩焘只能著书立说，不适合做封建官场的繁重工作。1837年，郭嵩焘19岁，参加乡试，考中举人。1838年，郭嵩焘第一次赴京参加会

试，名落孙山。直到 1847 年，他第五次参加会试，才考中进士，入翰林，跻身到上层社会。

1840 年，郭嵩焘经友人介绍，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其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郭嵩焘到浙后，亲见浙江海防之失，对浙江防务多有陈献。他对英国侵略者的入侵非常愤慨，“忠义之气，不可遏抑”。但由于清政府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得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对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缺乏起码的了解，又加之清政府上下在战争指挥上的失误，因此，自诩为“上邦大国”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被看不起的“岛夷”打败了。这一结局，对每一个有血气的中国士大夫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郭嵩焘亲历其中，更是感慨万千，他写了不少诗抒发自己的悲愤胸怀。这里选录两首：

三年沧海有奔鲸，烽火喧阗彻夜惊。
复道金缯归浩劫，枉从狐鼠乞残生。
鲁连无语摧梁使，季布何心续虏盟？
欲袖铁椎椎晋鄙，从谁改将信陵兵？

百丈飞船上海涛，诏书专下拥旌旄。
烟沙隔水千军卧，弦管连营一曲操。
老将云间歌敕勒，宗臣江畔泣离骚。
杜陵偃蹇干时策，泪洒将军大食刀。

在这两首诗中，郭嵩焘表达了对贪生怕死、妥协投降的无比愤慨，也表示了自己愿意为国分忧、挥师歼敌的爱国情怀。

鸦片战争使郭嵩焘的内心世界受到很大的震动，也使他对西方列强有了最初的认识，他开始认真思考“洋患”这个问

题。一方面，他与刘蓉、张晓峰等友人一起讨论时局；另一方面，他读书览史，希望从史书中找到应世妙方。郭嵩焘在考察中国自古以来边患产生的原因及处置边患的措施后得出一个结论：从古至今的边患，都不是由于敌人的强大造成的，而是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处置失误造成的。他认为，在处理边患这个问题上，不能不问情况，一味主战，而要因时度势，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来审度利害得失，来确定战与和等重大举措。

鸦片战争时，郭嵩焘年方二十有余，血气方刚，但他在探讨时局时，并不是只在简单地抒发纵论天下事的书生豪气，而是开始着手探寻中国致败的内在原因。从此以后，郭嵩焘与“洋务”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二、湘军高参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把战争费用、赔款等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五口通商又使传统的手工业、陆路商业受到严重冲击，这样就使得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人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在急剧增加。从1840年到1850年10年间，各地小股“民变”此起彼伏，1851年爆发的金田起义最终把反抗政府的农民、手工业者汇聚到一起，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

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入湖南。9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全省震动。为躲避战乱，郭嵩焘兄弟带着全家老小避入湘阴玉池山梓木洞，同时进山避乱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兴名将”的左宗棠。左宗棠也是湖南湘阴人，才华横溢，精研地理、兵法、经济

等学问，常以诸葛亮自比，自称“今亮”。当太平军打入湖南时，湖南巡抚张亮基根据贵州知府胡林翼的极力推荐，派人送重金礼请左宗棠到省协助军事。左宗棠摆出名士架子，没有答应。但就在这时，郭嵩焘却力劝左宗棠出山，干一番大事业。最后，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敦促下，终于踏上了镇压农民革命的道路。事有凑巧的是，在后来被称为清廷“中兴”的四位名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中，曾与李的出山也与郭嵩焘的力劝有关。因此，郭嵩焘在晚年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仍洋洋得意地说：“他们出将入相，都是我在关键时刻出了大力，也算奇了。”

郭嵩焘劝人出山，最后自己也被人强邀出来。太平天国运动在两湖如火如荼开展之时，湖南的地主阶级也在“保卫桑梓”的共同目标下形成一股日趋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郭嵩焘虽然深知自己文人气质太浓，出主意、当参谋还可以，但要亲自上前线，带兵作战，却是自己不感兴趣的。然而，当湖北按察使、同科举人江忠源在1853年以“为天下计”这顶大帽子压他时，他也就没有理由不出山了。因而，江忠源一激他，他也就参加到湘军这个大营垒里来了。这年5月，太平军围攻南昌，江忠源奉命率楚勇抵御。曾国藩又调罗泽南率一部湘军援南昌，郭嵩焘即随此军出征。从7月23日至10月28日，郭嵩焘追随江忠源，与太平军战于南昌、九江、湖北田家镇等地，屡战屡败，狼狈不堪。郭嵩焘未立寸功，又对艰苦的军旅生活不能适应，因而牢骚满腹。三个月后，他终于决计求归，与江忠源长揖而别。有趣的是，清政府却以他援江西有功，授为翰林院编修。

郭嵩焘在军中时间虽短，但对湘军和太平军的角逐却有

深刻的认识。他看到太平军水师声势浩大,控制了长江水面,而清军和湘军只能进行陆地作战,对太平军的水师唯有望江兴叹,莫能奈何,因此,他建议江忠源急治水师。这个建议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上影响不能算小。但面对纷纷扰扰的世局,郭嵩焘没有激流勇进,而是激流勇退,甘愿在湘军中扮演一个摇羽毛扇的高参角色。从1853年到1856年,郭嵩焘一直追随曾国藩,为曾氏兄弟献计献策,同时又主持湖南厘捐,为湘军筹饷,作好后勤工作。

在这一时期,郭嵩焘还于1855年底奉曾国藩命到浙江筹办盐务,实际也是为湘军筹饷。但郭嵩焘此行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他看到了洋钱、洋人、洋货,读到了洋书,参观了英国兵船和墨海书馆,与外国人有了实际的接触,这一切使得郭嵩焘眼界大开,对西方的文明有了虽是初步的但却比较真实的了解。此后,他就自觉地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关注西方文明这个问题,并力图把西方文明中优秀的东西移植到中国文化中来。

三、天子近臣

1857年12月,郭嵩焘离开了战火纷飞的江南,赴京任翰林院编修这一闲职。这表明郭嵩焘对没完没了的战事已深感厌倦,决定到北京另谋出路。

离开战火纷飞的江南,置身歌舞升平的京都,郭嵩焘又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当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调兵遣将往天津防堵,而北京官绅却对此无动于衷,依然酒食征逐,醉生梦死。对此情此景,忧时忧国的郭嵩焘深感悲哀,同时

他又为清政府不能重用曾国藩这样战功赫赫的忠臣良将而愤愤不平。

正当郭嵩焘事事伤感之时，忽然喜从天降。1858年8月31日，咸丰皇帝召见了。在封建社会，大臣被皇帝召见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1859年1月5日，咸丰皇帝又一次召见郭嵩焘。第一次召见，咸丰皇帝只问了一些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这一次，咸丰帝开始征询郭嵩焘对国家大局的看法。郭嵩焘本来就自负才高，现在咸丰皇帝居然向他征询对天下大局的意见，就忘了一切，侃侃而谈。他断言太平军不足虑，大清江山可保。咸丰帝大为高兴。郭嵩焘又谈了很多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如讲求吏治、认真办事等，还大肆吹捧了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王鑫等湘军将领，虽然只字未提湘军首领曾国藩，但弦外之音，咸丰帝自然听得出。这次召见，咸丰帝对他非常满意，当天就发下谕旨，命郭嵩焘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皇帝的咨询机关，大臣入值南书房，虽然没什么实权，但可以经常与皇帝见面，以后往外放官，往往优先照顾，前程无限，因此又被称为“天子近臣”。郭嵩焘得此殊荣，真是神清气爽，心情就与此前很不一样。次日，咸丰帝又召见郭嵩焘，一方面鼓励郭嵩焘多读有用之书，作有用之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为国效力，另一方面，又向郭嵩焘打听湖南名士左宗棠，并让郭嵩焘劝左宗棠为国效力，建功立业。通过数次召见，咸丰帝对郭嵩焘已有基本认识，对他寄以厚望，并决定派他随僧格林沁前往天津前线，协助办理天津防务。一个月后，僧格林沁正式奏调郭嵩焘随同办理天津防务。这样，郭嵩焘不仅为湘军接通了与最高当局的直接联系，而且也使南方的湘军与北方的蒙古骑

兵有了一种亲密的关系。湘军首领曾国藩听到这一消息，兴奋得不能自己。然而好景不长，这个梦很快就破碎了。

1859年2月26日，郭嵩焘上奏陈说海防事宜。咸丰帝看完奏折，当即就要召见他。郭嵩焘在召见时，一时高兴，忘了官场忌讳，直言指陈时弊，并要求皇上、五大臣通下情，结果弄得咸丰皇帝很不高兴。此后，咸丰帝再没有主动召见过郭嵩焘，他的“圣眷”已经到了尽头，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在天津，他又与僧格林沁在海疆防务上意见不合，因而合作不到一起，关系闹得很僵。这年10月，诏命郭嵩焘前往山东查办烟台等处海口贸易税收问题，由僧格林沁派员协办。僧格林沁打算刹一刹郭嵩焘的书生傲气，于是派心腹李湘棻前往。李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给郭找一罪名，以博僧格林沁欢心。时机终于来到，郭嵩焘自定开局抽厘，引发了福山县聚众殴毁厘金局的事件，李湘棻以郭嵩焘开局抽厘未与自己商量为由，飞报僧格林沁，僧即据此为词弹劾郭嵩焘。1860年1月2日，郭嵩焘接到交部议处的诏命。回京后，他又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因此，他心情抑郁，不久即以病为由，奏请回籍就医。4月中旬，郭嵩焘怀着“滔滔天下，吾安适哉”的怅惘心情，离京返乡。郭嵩焘虽然才华横溢，作风正派，办事果断，但由于文人气质太重，无法适应官场的圆滑机巧，又恃才傲物，因而，终究未能把握住这一难得的充当“天子近臣”的机会。对郭寄予厚望的湘军首领曾国藩看到郭没能在中央站稳位置，为他深感遗憾。

四、洋务观初步形成

正当清政府以全力与太平军作战时，英、法侵略者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引起了全国性震动，英法联军打入北京，咸丰帝逃亡热河，结果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面对日益严重的西方侵略，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的力量在分化，从50年末以后开始产生了一个新的派别——洋务派。这一派人物上有恭亲王奕訢等，下有地方实力派曾国藩等。他们在政治实践中，与洋人有了直接接触，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物质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改变着固有“夷狄”观念，对于来自西方的侵略者及其文化开始进行认真研究和严肃思考，提出了中国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的观点。于是，在国内很快就形成了一种洋务思潮。就当时中国而言，这是一种代表进步的思潮。

郭嵩焘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对洋务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颇有特色的洋务思想。郭嵩焘的洋务思想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他主张要了解西方，士大夫在这方面尤要身体力行。在当时的士大夫中还流行着比较普遍的虚骄习气，不屑于谈论洋务。抱有这种成见的人对洋人“始则视之如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情实”。这种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们一旦和洋人打交道，其结果只能是坏事，把局面弄得更糟。郭嵩焘则不是这样，他主张正视中外交往的现

实,不要回避,因为洋人既不是犬羊,又不是鬼怪,而是跟我们一样具有理智和文化的人。他们来华的动机可以考查,对于他们提出的非分要求可以用正当的方式予以拒绝,但是,中西互通已成定局,想拒洋人于国门之外是不可能的,因而,只有与他们达成一种中西正常交往的协议,划定章程,才是今天对待洋人的正确方法。如果把洋人视为野蛮人,不敢、不愿或不屑去研究、面对,都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和软弱。因此,他主张士大夫要抛弃“华夷之辩”的僵硬观念与恐惧心理,主动接触洋人,积极了解西方,研讨中国的对策。在1859年2月26日的奏折中,郭嵩焘向清政府提出了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培养洋务人才的建议。虽然当时清政府没有采纳,但三年之后,北京却建立了一所培养办理洋务人才的同文馆。由此可见,在当时郭嵩焘思考这一问题时,具有深远目光。郭嵩焘之所以呼吁当局和士大夫们去了解西方,是因为他自己就是通过一切可能的机会才了解西方情况的。他已认识到闭目塞听和开眼看世界这两种不同态度将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1840年在浙江,1856年在江浙,1859年在天津、山东,他都主动去了解西方的情况。60年代以后,郭嵩焘更是自觉地把开拓国人视野,矫正传统观念,宣传西方科技、文化、思想视为自己的责任,纵使被守旧的士大夫讥嘲、打击也不后悔。他的这种一心为国、不计个人荣辱的胸怀给后来者留树立了榜样。

第二,他对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守旧士大夫的虚骄之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对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总评价是:“处极弱之势,无可据之理,又于外夷瞢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诈胜。”这种批评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近代以来,中国已

明显落后于西方，而清政府却不去了解敌情，仍以天朝大国自居，因而，在不得已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时，采取的应变措施，不是错误百出，就是授人以柄，最后总是以丧失利权收场。而中国的士大夫不但没有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反而去助长政府的这种虚骄之气。于是“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撓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郭嵩焘严肃地指出，士大夫们的高谈阔论虽能博取爱国的空名，却无补于实际，只会进一步损害中国的尊严。

第三，他反对一切对外战争。郭嵩焘从中国国势不如西方列强这一认识出发，认为清政府应委曲求全，不能与西方列强开战，只能徐图发展。这一思想虽然纠正了崇尚清谈的守旧士大夫盲目主战的错误，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避战求和也是有条件的，西方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也是昭然若揭、清楚不过的。一味求和，只能助长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而不会消弭他们的侵略欲望。而郭嵩焘却对这些不管不顾，因此，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郭嵩焘的思想过于消极，是很偏颇的。

总之在五六十年代，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基本形成，虽然在个别问题上也有失误之处，但从总体上说，却代表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而且，郭嵩焘很注重宣传、解释他的洋务思想，逐渐成为洋务派中独树一帜的洋务思想家。

五、再次出山

1859年，郭嵩焘因僧格林沁参劾愤而辞官南归，在家闲居。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援上海，旋升江苏巡抚。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李鸿章保荐同科进士郭嵩焘任苏松粮道。郭嵩焘因第一次出任碰了大钉子，所以，心存犹豫，不想再出，但又经不住曾国荃、刘蓉、李鸿章等好友的再三苦劝，遂于这年10月赴上海接任。

在任苏松粮道期间，郭嵩焘看到所辖的苏州、松江、太仓等三府赋税太重，往往因此激起民变，因而向李鸿章提出了减赋的建议。1863年6月，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减轻苏松太三府粮赋。7月9日，清政府批准了曾、李的请求。此举的实行，普遍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好感。郭嵩焘作为这项措施的倡议者，其本意是在维护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但客观上却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当地百姓办了一件好事。与此同时，郭嵩焘官升两淮盐运使，他又通过整顿盐厘的措施，搜刮到大量财富，为湘淮军筹集了巨额饷银，因而，也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交口称赞。不久，郭嵩焘即被奏保升任广东巡抚。

在这一时期，郭嵩焘对西方的科技进步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他亲见英人为淮军演放“开放炮”，深感洋人兵精而器利。1863年3月，他到沙利洋行参观机器生产，对洋人的生产技术叹为观止。由此，他深深认识到，中国要想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只有向西方学习，除此别无它途。这时，正好他的好友冯桂芬向李鸿章提议在上海设立与北京同文馆类似的学校，用